

跨文化书写与后殖民文学研究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访谈录

张丽丽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摘要: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教授在访谈中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和澳大利亚语境的后殖民研究,厘清了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的一些概念术语以及后殖民研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帮助读者扫清了理论认识和实践运用上的误区。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认为后殖民作家通过文化挪用和语言转换来表现自我,后殖民文学以全新的形式在世界文学体系流通,是典型的世界文学。后殖民文学颠覆了欧洲现代性叙事,改变了文学生产和流通的传统模式。从后殖民视角解读英语文学中的文化表征,可以有效地分析作为世界文学的跨文化书写存在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比尔·阿希克洛夫特;世界文学;后殖民研究;跨文化范式

中图分类号:H1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2-0083-07

0 引言

后殖民理论家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FAHA),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1989年,阿希克洛夫特与格瑞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合作完成后殖民理论专著《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随后,三人继续合编了《后殖民研究读本》(1995)和《后殖民研究关键词》(1998),从理论专著到研究读本再到术语汇编,他们完成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阿希克洛夫特教授年逾七旬仍笔耕不辍,近期代表作有《凯里班的声音:后殖民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转换》(2009)和《后殖民文学中的乌托邦主义》(2017)。阿希克洛夫特将后殖民作为一种阅读策略和文化分析法,考察殖民地作家颠覆欧洲现代性叙事的语言和文化策略。国内学界对根植于前殖民地经验的后殖民文学研究相对比较陌生,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往往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等人的殖民话语研究相混淆。赵稀方认为萨义德的《东方学》只讨论了“东方主义”,并没有涉及“后殖民”,《逆写帝国》才是首先揭橥后殖民理论的著作(阿希克洛夫特等,2014:1-2)。为了厘清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模糊认知,笔者与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进行了多次对话^①。陈茂林等认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就是要具备与国内外学界的深度对话意识,进行文本细读,观照并关怀自然、社会和人生”(陈茂林等,2020:65)。本文从后殖民与跨文化、后殖民与世界文学和

收稿日期:2022-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尼古拉斯·周思的跨文化叙事研究”(18YJC752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丽丽,女,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英语文学和跨文化研究。

^①2018年6月,在第十六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研讨会上,笔者与阿希克洛夫特教授首次就后殖民研究进行了长谈,后来又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了后续对话。2019年春夏之交笔者赴澳访学,师从阿希克洛夫特教授,师生继续深入讨论“后殖民文学研究与中国”的话题。

引用格式:张丽丽. 跨文化书写与后殖民文学研究——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访谈录[J]. 外国语文,2023(2):83-89.

中国语境的后殖民文学研究三方面呈现中澳学者的学术对话,希望对国内后殖民文学研究者有所助益。

1 后殖民与跨文化

笔者:阿希克洛夫特教授,听说您曾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香港大学还授予您“杰出研究者”奖。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跨文化侨居经历和对中国学者的印象吗?

比尔:我在香港大学担任后殖民文学讲席教授三年,我接触的中国学者来自不同的华人地区。他们都非常勤奋,而且英语文学造诣很深,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对语言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鉴赏能力。我对华人作家使用的“新加坡英语”或“中式英语”尤其感兴趣,因为它正好印证了我在后殖民逆写理论中所阐述的“弃用”(abroga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的文本策略。

笔者:爱德华·萨义德被认为是后殖民理论创始人。我注意到您书架上有很多研究他的书。您在1999年对萨义德进行了专访,后来出了萨义德研究的专著和多篇相关论文,能简要评价一下萨义德对后殖民研究的贡献以及他对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研究的影响吗?

比尔:萨义德对“后殖民”这个术语仅用了一次而已,就被当作后殖民研究的发起人,这是一个理论旅行的神话。确切地说,萨义德是开启了作为后殖民研究先驱的东方话语理论研究。《逆写帝国》是对前殖民地国家英语文学的研究(又称英联邦文学),也是以萨义德的殖民话语理论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才开始用“后殖民”这个术语。虽然我写过一本萨义德的书,但我们在写《逆写帝国》时并没有研读萨义德的著作,因此不能说萨义德对我们的后殖民理论产生了什么影响。当然,萨义德与弗兰兹·法农(Frantz Fanon)都是后殖民研究的先驱,《东方学》对他者表现的研究、萨义德对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强调还有他的世界性理论都是后殖民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萨义德对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澳大利亚文学总体上就是后殖民文学的一部分。帝国权力不是封闭的,而是流通再生产的。殖民与被殖民、边缘与中心都不是固有的存在方式,会随着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变化发生转变。理解这点就能更好地理解后殖民状况的多样性构成。澳大利亚代表了一种显著的后殖民状况:他们的抵制和改造策略与其他殖民社会相似,但内容却很不同。殖民时期,他们在移植文化与本土环境之间左右摇摆;民族化时期,他们通过后殖民逆写表现自我从而复兴本土文化。他们继承了殖民主体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表现形式,又想超越二元对立的模式,勾勒出模棱两可的跨文化表征。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且有争议的议题就是土著问题。定居殖民地有一个矛盾的殖民现象,那就是白人定居者“殖民”(土著)与“被(英国)殖民”的双重身份。土著人至今仍处于被殖民状态,但我们所说的“后殖民”并不是“殖民之后”,不是时间上或本体论上的理论术语,而是“侵略以后”的一种变化了的阅读方式。经典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全球蔓延,而土著作家也采用同样的语言和叙述策略,因此后殖民研究对土著文学的阐释也具有有效性。

笔者:您在论文中说,“后殖民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但是“后殖民状况不止一种”(Ashcroft, 2014: 3-20)。这是否意味着后殖民批评也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而不是稳定的身份?阅读您的著作清单,我发现一个清晰的学术轨迹:从抵抗性的“逆写”到交互性的“转换”再到面向未来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您能概述一下不同阶段的批评立场吗?

比尔:当然,批评家需要根据社会现状调整自己的思想,但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主体具有能动性。人们对“殖民”有一个常识性误读就是它是彻头彻尾的文化灾难,这种观念无视被殖民社会对帝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而我一直很关注被殖民主体对欧洲主导的政治和文化做出的反应。我们不能将“后殖民”简单界定为“反殖民”立场,因为殖民主体也不全是卑劣的侵略者,有些殖民经历会对本土文化发展有益。后殖民社会往往会沿着殖民实践的文化发展道路,却又体现出非凡的创新和改造能力。很多批评家认为殖民破坏了土著文化,但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文化是静止的,它低估了后殖民社会的文化重塑能力。不仅如此,本土文化通过自身的神塑和改造不经意间也改变了帝国文化的特性。这种交互的跨文化影响不是流畅的或者千篇一律的,但它促使我们去重新考量习以为常的受害立场,反思主体的能动性。

“乌托邦主义”是后殖民批评的目标,我们通过畅想未来检验被殖民主体有没有改造帝国文化的能力。“乌托邦主义”历史悠久,在20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幻小说相结合产生了新的语义。鲁斯·列维塔斯(Ruth Levitas)将“乌托邦”界定为“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欲望,通过描述完全不同的社会来表明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Levitas, 1995: 257)。“反殖民乌托邦”关注的是独立民族国家的前景;而“后殖民乌托邦”/“乌托邦的后殖民愿景”则是坚信有一个改造了的未来。成功的抵制具有改造力,而改造/转型有赖于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人们总是忽视这一现实。如果不相信有一个彻底改造的未来,政治抵制也无法继续。因此,后殖民文学与传统的殖民抵抗立场背道而驰,后殖民作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后殖民文学旨在为读者提供愿景。

笔者:艾瑞安娜·达格尼诺(Arianna Dagnino)在《全球流动时代的跨文化作家与跨文化小说》中指出后殖民研究已经过时,在全球化时代应该以求同的跨文化视角来替代敌意的后殖民视角。(Dagnino, 2015)您觉得跨文化范式是对后殖民的挑战吗?

比尔:很多人将后殖民作为批判的靶子来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但跨文化范式在后殖民研究中根深蒂固。达格尼诺一定没有读我的著作,我认为“跨文化”一直是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不时有“后殖民终结”论传出,但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以不同形式的文化介入(cultural engagement)来丰富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只要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仍然存在,后殖民研究就不会过时。我不担心所谓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对后殖民的挑战,让我忧虑的是“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本义与另一个“跨文化”(cross-cultural)相混淆。我想重申一下,后殖民研究中的“跨文化”并不是简单的表层的跨越两种文化的界限,在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都发生了变化,过渡和转型是“跨文化”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跨文化”不是浅层的拼盘色拉式的文化交流,或是单向的文化渗透,而是深层的双向文化交流,交流双方都发生了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笔者:有学者将德勒兹喻为术语制造机,您也非常善于发明并界定理论术语。但太多的术语会让初学者混淆。“后殖民”这个词本身就很难界定了,您后来又提出“后民族”和“跨国”的概念,能不能请您区分一下“后民族话语”“跨国话语”与“后殖民话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比尔:“后民族”(postnational)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就像“后殖民”不是“殖民之后”,“后民族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之后”。“后民族”视角存在于民族国家之内,从属于“民族主义”,介入其中并试图改造“民族主义”。“后民族”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存在了,或者说民族国家对我们的生活不重要了。民族国家仍然是界定民权、人权和经济权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民族国家有权对其公民提出要求。“后民族”描述的是一群穿梭流动于国家内外的主体和他们的跨国境遇。这种境遇

恰好与我的“跨国理论”有契合。“跨国”是从国家内部开始向外部的流动和迁徙。“跨国”主体代表了频繁的重组和超越政治范畴的国际团体,他们在居间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经常身在其中又置身事外,因而他们对所观察到的日常生活持有不同于普罗大众的异见。

笔者:作为定居殖民地和移民国家的澳大利亚人家园感比较淡漠,他们大多有世界主义认同。世界主义认同与家园归属似乎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您如何阐释澳大利亚人这种复杂的“归属感”?

比尔:这个话题很宏大,目前我正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归属问题存在于土著与新来者之间的冲突。这些新来者包括白人定居者,也包括20世纪以后的移民。什么是“归属”?首先,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归属”是一个间歇性的、流动的过程,一个被历史纠缠的概念。谁要“归属”?“归属”于什么?简要概括一下我的立场:“归属”并不是发生了的事件,也并不因国家给了我们公民身份就有了归属。“归属”是人类的一种复杂行为,可能被他人的凝视深深影响,它具有操演性。

2 后殖民与世界文学

笔者:世界文学是一个跨学科的“想象共同体”,语言学家、批评家、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都以他们的方式分析世界文学作品。您如何界定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文学研究?

比尔:后殖民文学研究重点关注全球范围内文学文本的语言转换、文化互动和跨文化影响,分析和阐释文化全球化传播带来的各种问题。全球化理论日益凸显了世界文学的全球化现象,激发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新课题。全球化理论的“文化转向”源自人们对“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模式的不满,但讽刺的是,这种模式又成了世界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他的理论源自从属理论,依赖的是过时的线性的中心-边缘观。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时表达了他的美好理想——诗歌可以超越时空,是人类共同财富。但文学超越国别界限必然导向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强调欧洲文学的伟大性与普世性。歌德所给予欧洲文学的特权地位直接导致了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的世界文学理论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学的戏仿: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结构再现了过时的帝国几何学。后殖民文学展示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而依赖的条件是“块茎”(Rhizome)模式。“块茎”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利(Félix Guattari)基于植物学“块茎”概念生发出的哲学概念,以区别于等级化的二元对分类和树形的知识概念体系。德勒兹称“块茎”为“思想的图示”,它允许理论研究中数据表征和阐释的多元共存和非线性影响。块茎模式的特征在于符号链、权力组织和社会环境之间不断地产生新的联系。“块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总是处于居间状态。“块茎”模式下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本源,澳大利亚文化就属于这种“块茎”模式。

大卫·达摩罗什(David Damrosch)从全球化的角度将“世界文学”界定为:“在本源文化以外流通的所有文学作品。”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无论产生于何时何地,只有在一个文学体系内又超出本源文化之外,才能有效展现它世界文学的生命”(Damrosch, 2003: 4)。有鉴于此,我的观点是后殖民文学是典型的世界文学。后殖民作家通过对宗主国文化的挪用和翻译语言的变形,达到表现自我的目的,并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流通。我认为这也是在世界语境中解读澳大利亚文学的最佳方式:考察他们如何应对帝国话语控制,如何改造帝国语言。后殖民作家通过篡改已有的文学生产流通模式,借助已有的帝国关系网进入世界。基于共有的殖民统治现实,后殖民批评显然是世界文学最直接有效的阅读方式。后殖民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延伸,得益于它

在体制上被排除在英语文学经典之外。这种排斥打破了社会、文化和历史上与英国文学的附属关系,让他们获得了解放。简而言之,边缘作家被排除在经典之外,但他们挣脱了传统的束缚而获得了创作的自由。

笔者:由于世界文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如何运用理论成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后殖民研究和符号学都可以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为文本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但符号学的文学解读可能被视为过时的结构主义方法;后殖民的文学解读又有被指脱离文本的危险。理论与文本分析两张皮是初学者在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如何才能走出这个两难的困境?

比尔:你这里涉及好几个问题。理论应用本身不是问题,但作者需要弄清楚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文本来印证理论,还是借助理论来阐释文本?通常情况下专研理论的学者对理论的兴趣高于文本本身。运用理论进行文本分析时我们需要问自己:理论有没有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本?我同意符号学也具有跨文化性,但符号学并不总是解读文学文本的最佳方式。我在为学生讲解理论时通常会运用一个文学文本来检验它的适用性,但在出书和发表文章时我考虑的是揭露文学文本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复杂性。后殖民研究的目标就是揭示文学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理论运用得越含蓄越好。

笔者:我在读文化研究的相关专著和论文时,发现后殖民视角通常以求异为目标,而世界文学又旨在求同,二者之间的矛盾似乎说明后殖民视角不适合世界文学研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比尔:我认为这种观点将世界文学和后殖民研究都过度概括了。我们可以说文化差异问题以及作家如何表现文化差异是后殖民研究关注的重点,而世界文学则更关注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在于“哪一个世界”需要界定。对许多批评家来说,“世界”仍然是中心-边缘对立的二元世界。后殖民视角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世界文学,但对前殖民地文学肯定适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帝国的侵略和征服仍然存在,它的最新变体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渗透,所有主体都不可避免地裹挟其中。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殖民与世界文学产生了交集,它们都试图遏制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传播。后殖民研究就是要设法探讨并解决这一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它当然适用于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分析。

3 中国语境的后殖民文学研究

笔者:自20世纪末开始,后殖民研究在中国语境的适用性一直存有争议。有学者发现“中国知识界在想象中完成了后殖民过程,所谓的殖民化不过是一种虚构”(徐凤秋,2017:246)。质疑者认为后殖民所讨论的议题与中国现实不相符,没有必要把“别人家的问题”硬往自己身上套(盛宁,1998:50-69);中国学者“没有必要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寻找自己的话语策略”“这种无端地把不构成实际威胁的外部问题炒热放大,以图获得所谓全球性文化割据的辽阔视野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理论的错位”(杨金才,1999:150-157)。支持者则认为后殖民文学研究“必须敢于突破大国中心主义,立足民族文化,从自身被殖民的历史为人们提供的特有立场去阅读和审视一切曾经受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学”(王腊宝,2002:95-99)。您如何看待中国语境的后殖民文学研究?

比尔:首先要重申一下我所说的“后殖民”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而是一种文学阅读方式或文化分析方法。所以,不存在后殖民议题与中国现实不相符合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从后殖民视角阅读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以上海为代表的租界,还有超过80个通商口岸沦为欧洲列强的殖

民地,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对西方的态度。随着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迅速崛起和日益强大,曾经的受害者立场也已经不适合阐释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关系。因此,中国语境的后殖民文学研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笔者:您在论文《包含中国》中尝试从后殖民视角解读北岛的朦胧诗(Ashcroft, 2013: 357-377),但这种阅读方法在中国恐怕难以产生共鸣。中国学者更倾向于考察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比如“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您如何看批评视角与批评立场的问题?

比尔:如何将中国纳入后殖民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阅读中国的后殖民视角不是单一的,“包含中国”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显然你提到的“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是华裔学者喜欢做的课题,它更适合流散文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做一些修正和补充也不是不可以,但对澳洲的读者不会有太大吸引力。《包含中国》发表后,我对自己的论断不仅没有怀疑,反而更为强烈了。当然,中国的状况与英帝国不同,作家们并没有被迫学习英语并把它作为自我表征的工具,但文学中仍然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压制与抵抗。写作中的后殖民抵制更为微妙,就像读北岛的朦胧诗。中国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用后殖民视角解读欧裔作家的中国书写。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复杂又有吸引力,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很多。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位有学者气质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他生于加尔各答,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曾在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他的“朱鹭三部曲”^①(*Ibis Trilogy*)以大英帝国为背景,讨论了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我很期待看到中国学者分析戈什的“朱鹭三部曲”。

笔者:您的建议很好,戈什的“朱鹭三部曲”倒是挺有意思的,我会特别关注一下。如果“后殖民乌托邦主义”旨在提供愿景,最后请您给中国年轻学人一些寄语,也为中国的后殖民研究提一些建议。

比尔: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对后殖民研究越来越有兴趣,后殖民文学在世界的广泛流传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分析资源。我期望未来的艺术家和作家合力展示给政治家一个团结合作的未来。后殖民研究可以持续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当下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种族与种族主义;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消解与民族问题之间的悖论;语言与文化挪用问题;文学类型的转变;民族问题与国家的关系;中心与边缘之间人口的逆向流动。而后殖民与种族、性别、阶级研究的交叉影响又拓展出新的研究兴趣点,深入到知识流通的各个学科领域。中国学者可在以下方面有新的突破:第一,考察汉文化语境下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第二,研究华裔流散作家作品;第三,继续中国视角的欧裔后殖民作家研究;第四,分析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我对中国的后殖民研究前景非常看好。从学术队伍和研究成果来看,未来中国的后殖民文学研究不容小觑。

笔者: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后殖民文学研究的肯定,也感谢您百忙中解答我的疑惑,让我顿觉头脑中的概念清晰了很多,对后殖民文学研究的认识也深入了不少。希望我们的对话也能够让这篇文章的读者朋友获益,真心希望全球化的后殖民文学研究可以“悦纳中国”。

比尔:那我将备感荣幸。

参考文献: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① “朱鹭三部曲”是以183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东方殖民史为背景的小说:第一集《罂粟海》(*Sea of Poppies*, 2008),第二集《烟霾之河》(*River of Smoke*, 2011),第三集《烽火狂潮》(*Flood of Fire*, 2015)。

-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1995.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1998.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shcroft, Bill. 2008.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Edward Said*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shcroft, Bill. 2009. *Caliban's Vo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shcroft, Bill. 2013. "Including China: Bei Dao, Resistance and the Imperial State" [J]. *Textual Practice*, 27(3): 357-377.
- Ashcroft, Bill. 2014. *Postcolonial Theologies: Storyweaving in the Asia-Pacific* [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20.
- Ashcroft, Bill. 2017. *Utopianism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M].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 Dagnino, Arianna. 2015. *Transcultural Writers and Novels in the Age of Global Mobility* [M].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Damrosch, David. 2003.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élix.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vitas, Ruth. 1995. The Future of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G] //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G. Robertson and L. Tickner.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57.
-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格瑞斯·格里菲斯, 海伦·蒂芬. 2014. 逆写帝国: 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M]. 任一鸣,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茂林, 陈韵祎. 2020. 对话意识·文本细读·当下关怀 [J]. 外国语文 (1): 65.
- 盛宁. 1998. "后殖民"文化批评与第三世界的声音 [J]. 美国研究 (3): 50-69.
- 王腊宝. 2002. 走向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 95-99.
- 徐凤秋. 2017. 20世纪末期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反思 [J]. 社会科学战线 (8): 246.
- 杨金才. 1999.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进与缺失 [J]. 当代外国文学 (4): 150-157.

Trans-Cultural Writing and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Bill Ashcroft

ZHANG Lili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Bill Ashcroft clarifies some key terms in Australian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n he relates world literature with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analyses problem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Professor Ashcroft holds that postcolonial writers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Postcolonial writings subverted European modernist narrative and transformed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into a new form, which is typical world literature.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to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s effective to analyze various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transcultural writings as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Bill Ashcroft; world literature; postcolonial studies; transcultural paradigm

责任编辑: 李小青